

郑学益 著

中國价格思想 史 稿

中国物价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1 0354 4

中国价格思想史稿

郑学益 著



中国物价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098号

中国价格思想史稿

郑学益 著

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25印张 169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7-80070-308-8/F·240

定价：5.00元

前 言

中国价格思想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在神农氏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与农业相分离。于是，从事畜牧业与从事农业的部落之间，经常进行着畜牧品与农产品的相互交换。《易传》记载：神农之世“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交换的发展，又引起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并且产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尧之治天下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②舜在担任氏族部落领袖之前，曾“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奴隶制的产生，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奴隶制时代。

由于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参加交换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物物直接交换就越来越显得不方便。人们从交换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应该先把自己的商品换成大家普遍愿意接受的商品，这样从众多商品中分化出来了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即货币。于是有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同其他行业分离开来了。因为产生了货币，商品交换才真正分裂为卖和

①《易·系辞下》。

②《淮南子·齐俗训》。

③《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买两个对立的经济活动，商人才有可能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或在生产者和生产者之间，作为第三者从事商业活动。

夏代时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货币——天然海贝。由于贝体积小，便于携带和保存，又坚固和持久，因此商代也普遍采用海贝作为货币，商王和贵族经常用贝赏赐属下。在我国文字结构中可以看到，凡与财富有关的字，多从贝。在我国历史上，牲畜、粮食、毛皮、布帛、珠玉、金、银、铜等等都起过货币的作用。这些一般等价物从贝壳、牲畜等逐渐发展为贵金属，最后又发展为用纯粹是象征的纸币来代替。

自从货币出现以后，各种商品首先同货币相交换，使本身的价值先在货币上反映出来，而表现商品价值的一定量货币，这便是商品的价格。随着价格的问世，这种客观存在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意识形态中，从而价格问题成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探讨和讨论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

从微观方面看，人们常常与价格打交道，发现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变动，这种涨落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人们的命运，安排着人间的吉凶祸福。价格波动的奥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促使人们进行不懈地探索，企图找到解开价格涨落之谜的线索。从宏观方面看，价格关系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是经济、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各个朝代的统治阶级都要制定和推行有利于自己统治的价格方针和政策，对市场上的商品供求、价格变化、货币流通等等进行全局性管理，封建王朝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价格管理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主张，并且进行了理论说明和宣传。这样，随着实践的积累、认识的深化，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价格思想。

中国传统的价格思想，是指从春秋战国直至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价格思想。之所以称其为传统的价格思想，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价格思想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也就

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在中华民族的范围内长期积累和形成起来的，打下了本民族的深深烙印。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上，有着对外开放的思想传统，历代中国人民珍视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联系，对与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怀着强烈的愿望和要求。但是，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价格思想，不可能产生学习外国的要求，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很少的。只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西方的价格思想学说才被介绍到中国来，人们在研究价格问题、制订价格政策时，才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价格学说的影响，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或方案主张，开始不属于中国传统价格思想的范畴了。这也是本书之所以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先秦至19世纪中叶的缘故了。

中国的传统的价格思想可以分为微观价格思想和宏观价格思想两大部分。微观的价格思想主要有“物情”论、“多寡”论、“资币”论等。

“物情”论探讨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战国时代的孟轲对商品的价值有所触及，隐约认识到商品内在的“情”决定价值，他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①。后期墨家接触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相对价值问题。荀况则谈到了价格的等同性。但是，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对商品价格起决定作用的这个“情”即价值的实体究竟是什么。到了明代中叶，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劳动价值论萌芽。丘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揭开了“物之情”这一谜语的谜底。他说：“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②。也就是说，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功力）的深浅大小，决定一切商品的价值多少。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用劳动的难易程度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大小。

①《孟子·滕文公上》。

②《大学衍义补·铜楮之币下》。

遗憾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微观价格思想中，“物情”论并不占主要地位，颇为流行的是“多寡”论，即用商品的供求多寡来解释价格的高低变化。子贡最早提出了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他认为玉的数量少，所以价格贵；而珉（一种石头）的数量多，所以价格贱。范蠡、白圭在经商中也强调供求行情的变化对商品价格的涨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管子·轻重篇》中则明确概括为一个公式：“多则贱，寡则贵”。从此，“多寡”论在中国传统的微观价格思想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直到明代中叶前，都没有什么人表示异议。

中国传统的微观价格思想中，还探讨了货币价值与商品价格的相互关系，即“货币”论。春秋时期的单旗首先提出“量货币，权轻重”^①的主张，这里的“资”指商品，“币”即货币，“量”是衡量之意，也就是说要用商品价格来衡量货币的轻重即货币的相对价值。他还主张，通过发行重币或轻币，来达到调节物价的目的。汉代的贾谊提出，要通过货币的投放或回笼以稳定物价，使“货物必平”。《管子·轻重篇》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与货币价值成反比，却与商品价格成正比，把货币数量的变动作为商品价格涨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的张林、唐朝的刘秩和陆贽也都是用货币数量的增减来解释货币价值的高低，进而说明物价的上下波动。纸币出现后，一些思想家又分析了纸币流通数量与币值、物价相互之间的关系，认为纸币发行数量多，就会贬值，从而造成物价上涨；纸币流通数量少，币值就会上升，物价就下跌。

中国传统的微观价格思想虽然包含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历史遗产，但从总体上看，是不很发达的，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比较少，对价格问题的微观分析是较为薄弱的。即使出现了像“物情”论这样较为出色的价格思想观点，但也是比较零散、不成系统的。

^① 《国语·周语下》。

而在中国传统的微观价格思想中占有较大分量的“多寡”论、“货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宏观价格思想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例如，单旗是从反对国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角度提出“量货币，权轻重”；《管子·轻重篇》研究并运用“多则贱，寡则贵”的理论原理，以加强封建国家对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的控制、干预。

中国传统的宏观价格思想是特别发达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权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封建经济基础，为了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必须从整个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对价格进行宏观管理，处理和调节商品供求、价格变化、货币敛散、财政收支等方面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缓和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价格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同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居于绝对支配地位，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具备了进行价格管理的条件。因此，中国传统的宏观价格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其中包括了不少价格管理的主张、方案以及对这些主张、方案的理论论证和说明。

中国传统的宏观价格思想可以划分为“法令”论、“平准”论和“因之”论三大类型。“法令”论主要以商鞅、《周礼》为代表，主张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来控制、干预价格活动。“平准”论强调国家政权研究、利用价格的有关规律和原理，通过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和经营工商业，以取得对价格的操纵权、控制权，从而达到打击商人资本、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它是由先秦的范蠡、李悝开其端，而在《管子·轻重篇》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桑弘羊则把此理论付诸实践。从此以后，“平准”论的价格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宏观价格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之”论的特点是，反对封建国家对价格的过多控制和干预，要求在价格管理中实行放任政策，听任价格的上下波动，顺应私人进行求利，从而使市场供求和价格涨落能够得到自发的调节。它

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形成了明确的形式和理论范畴。后代凡是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的价格管理思想主张，都是对“因之”论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传统价格思想的发展，大体呈现为以下几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价格思想的奠基阶段。在这个阶段，微观方面，产生了单旗的“资币”论、子贡的“多寡”论、孟轲的“物情”论等等；宏观方面，商鞅、《周礼》提出了“法令”论，以范蠡的“平粢”、李悝的“平籴”为代表的“平准”论已经出现，公孙侨的“市不豫贾”政策、战国齐法家有关价格问题的思想主张等，则表明“因之”论已露端倪。

西汉前期是中国传统价格思想的成熟阶段。在宏观方面，“法令”论的价格管理思想主张为《管子·轻重篇》和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所吸收，形成了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法律手段为辅来控制、干预价格的“平准”论的价格管理模式；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因之”论的价格管理模式也在此时出现了。这两种对立模式的形成和确立，为此后两千年中国传统的宏观价格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出发点和基本依据。而在微观方面，认为供求决定价格的“多寡”论，探讨币值与价格相互关系的“资币”论，则被纳入了“平准”论的价格管理模式之中，成为封建国家政权控制、干预市场和价格的理论指导。上述种种都是中国传统的价格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

西汉后期至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价格思想的渐进阶段。在这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价格思想基本上是在前一时期形成的框架下缓慢地发展着，尽管未发生质的变化，但仍然有所前进和提高，出现了不少有新意、有特色的价格思想主张。

在宏观方面，唐代的刘晏、白居易，宋代的李觏、王安石，元代的卢世荣等人的价格思想，都是沿着平准理论所开辟的方向发展前进的，从而构成了各种具有“平准”色彩的价格管理思想

新模式。而宋代的苏轼、叶适和明代的丘浚等人则是“因之”论价格管理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因之”理论有所继承、发展或修正。并且，针锋相对的“平准”论和“因之”论，也在互相撞击和交融。无论是刘晏理财还是王安石变法，在干预为主的同时，也辅以相当程度的放任。而丘浚等等也不是完全排斥干预手段的运用，在放任的大前提下，其价格管理中的干预因素有所增加。

在微观方面，虽然供求决定价格的“多寡”论一直是颇为流行的思想观点，但沉寂已久的“物情”论却有了突破。丘浚、王夫之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为揭开“物之情”的奥秘作出了贡献。“货币”论被一些思想家用于分析、说明纸币与价格的相互关系，从而在理论上增添了一些新内容。

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中国传统价格思想的衰落阶段。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彻底腐朽和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深入的侵略，这个阶段的一些思想家却仍然在用中国传统的价格思想范畴来进行分析和探讨，企图解决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引发的白银外流、洋钱溢价、通货膨胀等等问题，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中国传统价格思想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反映。

我国的历史悠久，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有关价格问题的观点和主张散见于各个时期的经济、哲学、史学、文学等等著述以及政治纲领、经济政策中。将这些资料挖掘、整理出来，并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传统价格思想的研究起步较迟、进展不快，已发表的研究论文不多，更没有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著作问世。我不揣浅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只能算是初步的尝试和探索。今天将这部不成熟的著作奉献给广大读者，欢迎多多赐教，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拓荒者，投身到这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沃土上来。最后，谨向赵靖先生、石世奇

老师多年来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致以深深的谢意；对大学同窗
毕井泉好友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1993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价格思想	(1)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1)
第二节 公孙侨	(5)
第三节 单旗	(7)
第四节 儒家	(9)
第五节 商家	(13)
第六节 墨家、农家	(17)
第七节 法家	(19)
第八节 《周礼》	(25)
第二章 西汉前期的价格思想	(29)
第一节 秦至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29)
第二节 贾谊	(35)
第三节 《管子·轻重篇》	(39)
第四节 司马迁	(57)
第五节 桑弘羊	(63)
第六节 耿寿昌	(73)
第三章 西汉后期至东汉的价格思想	(77)
第一节 西汉后期至东汉的社会经济状况	(77)
第二节 王莽	(81)
第三节 王充	(89)
第四节 张林	(91)
第五节 刘陶	(93)

第四章 唐代的价格思想	(95)
第一节 唐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95)
第二节 刘秩	(98)
第三节 刘晏	(101)
第四节 陆贽	(110)
第五节 白居易	(113)
第六节 李珣	(117)
第五章 宋代的价格思想	(119)
第一节 宋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119)
第二节 李觏	(124)
第三节 王安石	(132)
第四节 苏轼	(139)
第五节 张方平	(143)
第六节 周行己	(146)
第七节 叶适	(149)
第八节 董煟	(152)
第九节 辛弃疾、杨冠卿、袁燮等人	(157)
第六章 元代的价格思想	(163)
第一节 元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163)
第二节 卢世荣	(166)
第三节 王恽	(168)
第七章 明至清代前期的价格思想	(173)
第一节 明至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173)
第二节 丘浚	(177)
第三节 王夫之	(187)
第四节 杨锡绂、洪亮吉	(191)
第八章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价格思想	(195)
第一节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195)

第二节	林则徐、魏源	(198)
第三节	王瑩	(202)
第四节	许楣、许梈	(205)
第五节	王茂荫	(209)
结束语		(215)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价格思想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奴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生产方式逐渐产生和发展，封建制度最终取代了奴隶制度。

推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代，铁器工具开始使用并且逐步推广到各生产领域。在现代考古中，齐、吴、楚等国的故地都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铁器、铁冶遗址。铁器的出现，使农业生产中的木耜变成了铁耜，使用了牛耕。《国语·晋语》记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意思是原来作为宗庙祭祀用的牛，现在将用来耕田了。铁器工具的使用，也为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楚国的芍陂，就是春秋时期修筑的蓄水灌溉工程。这一切对生产力的提高尤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到了战国时期，铁器农具已获得普遍应用，并且种类增加了，质量改进了，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农业产量大大增加。水利灌溉工程出现了新局面，各国都有引河流、湖泊之水以灌溉农田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魏国兴建最早，在魏文侯、魏襄王在位的一段时间里，邺（今河北临漳西）的劳动人民在西门豹组织下，开凿了 12 条大水渠，引漳水灌溉邺地的农田，使自古以来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这个工程，后代不断加以修治，一直到唐代以前

都还在起作用。

秦国有都江堰。公元前 320 年，蜀郡人民开始了制服岷江的工程，他们在今灌县所在地，疏导岷江，消除水患。接着又筑坝修堰，控制了岷江洪水，凿山挖沟，开出了总长达 1165 公里的干渠和支渠，形成完整的灌溉网，使成都平原 300 多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从此蜀地变成了富饶的“天府之国”。

郑国渠是秦国的又一大水利工程。关中人民在韩国水工郑国的主持下，修建了沟通泾水和北洛水的郑国渠，长达 300 多里，灌溉面积达 400 多万亩，农田上长出了茂盛的庄稼，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①。

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明显进步。这时人们不但已懂得施用多种动植物肥料，而且注意到了肥料种类、土壤性质和农作物收成的相互关系，因地制宜地种植庄稼，并进行土壤改良。这些宝贵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知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剩余产品增加了，有更多的农产品转化为商品。

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在官府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之外，出现了从事商品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并且人数不断增多，投入流通的手工业产品种类和数量都在增加，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春秋时期的铜器，精致美观，采用分铸和焊接的技术方法。花纹也改变了过去单纯雕镂的工艺作法，创造了印板捺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如有名的《吴王光剑》的火焰花纹和《越王勾践剑》的菱形花纹，都雕刻得十分精美，剑芒锋利，至今还能断发。到战国时，青铜制造工艺达到了更高水平。从传世和新出土的铜器看，这一时期的青铜兵器比以往更为犀利了。器物方面，生活用具增加了，而且讲究轻便、灵巧、美观。铜器的装饰花纹，值得提出的是镶嵌与细线精刻。前者如河北唐山市贾各庄出土的狩猎纹壶，以异色铜质镶嵌，花纹清晰

^①《史记·河渠书》。

醒目；后者如河南辉县赵固镇出土的燕乐狩猎鉴，壁薄而坚，里面用利刃精刻，纹细如发。

春秋战国时期的纺织业也有所进步。纺织品的种类增加了，出现了彩色绚烂的锦。《诗经·小雅·巷伯》有“成是贝锦”之语，郑玄解释道：“犹女工之集彩色以成锦文”。用各种颜色的五彩丝线织锦，说明已经采用了更为先进的纺织技术。此外，还生产出了绮、帛、绂、缙、绢、刺绣等等各种丝织品。长沙楚墓出土的麻织品，它的经纬纱的密度，超过了现代的平白细布，可见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的制陶业、煮盐业、竹木业、皮革业、漆器业、染色业等等也都很发达。出现了一批技术精良而名闻列国的手工匠师，还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手工业操作的书籍——《考工记》。

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必然地推动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时期，“工商食官”的局面日益被打破，由新兴地主、平民、手工业奴隶、商业奴隶以及没落奴隶主转化而来的自由商人出现了，逐渐取代官营商业而居优势地位。其中一些大商人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较大影响。例如，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外出做生意，途遇要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他急中生智地假托君命犒劳秦师，秦国以为郑国已有准备，只好退兵。这个故事说明弦高不仅是个大富商，而且也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郑国还与商人订立盟约，商人不做损害国家的事情，官府也不侵犯商人的利益。晋国的商人，也很有势力。《国语·晋语》评论他们是“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这些富商大贾的存在，反映了当时商业的活跃。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例如，定陶地处齐、鲁、卫、宋之交，居古代“午道”之上，是东西南北交通枢纽、货物交易集中的商业性城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各国出现了许多大、中城市，“三里之城，七里之